

【农民问题】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及其价值实现路径

——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的探索

杨康,沈苏燕,李放*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结合重庆 A 区“积分互助”养老案例发现,结构功能失衡与个体消极行动共同型构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具体表现在: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安排滋生机会主义,放大层级分割负面效应;运作框架及其规则供给无法发挥社会交换和有效行动构成功能,抑制福利生产与福利价值输出;结构转型引发社区空间结构性变化并弱化了行动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动力,而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及参与者行动的例行化进一步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 with 集体价值创造,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沦为形式化与工具化。因此,应从厘清多元主体权责关系,健全制度化实施机制,设计可持续生产工具,培育行动者内生动力等方面入手,来优化“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与价值实现。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时间银行;农村互助养老;“结构-行动”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2)06-0102-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以其独特的社会交换机制促进人的积极性发挥,能产生福利供给、社会治理等综合效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2018 年,“时间银行”被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试点范围。部分农村地区亦开始积极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如河南新乡、浙江义乌、江西大余、江苏张家港等。在具体实践中,“时间银行”呈现出两种方向:一是“社区货币”,即遵循市场贸易逻辑,将服务时间折换成“货币”,并用来兑换、购买相应的物品;二是“志愿服务”,即遵循公益交换逻辑,以服务来换取服务^[1]。然而,从农村实地的调研来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并不必然能带来良好的福利生产和福利价值实现。由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在具体情境中是如何被实践的?面临何种困境?其内在机理是什么?应如何治理?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 分析框架

作为实践中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并不限于技术面向,而要更多关注“时间银行”技术嵌入具体情境的具体可行的实践过程。换言之,要剖析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果呈现,既需

收稿日期:2021-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民获得更多土地财产权益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17ZDA076)

作者简介:杨康,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绵阳师范学院人事处;沈苏燕,女,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放(通信作者),女,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要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场域内的激励性、制约性客观条件入手,理解“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活动的结构条件,也需要根植于具体行动过程考察行动者的能动创造与策略行动。因而,需要寻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结构-行动”视角,通过“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立体分析,揭示其运作的内在机理。

针对“结构-行动”议题,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2]522}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提出“结构二重性”,即结构是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吉登斯^{[2]52}还指出,结构是社会在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行动是行动者对实践事件进程施加影响的连续过程。其中,资源是社会生产与活动的前提条件,可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向经济、设施等物质资源,本质是对自然的支配能力;权威性资源指向情感、权力、社会资本等非物质性资源,本质是对行动者的控制能力。规则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一般化的程序^[3]。为了便于理解规则,吉登斯以国际象棋对弈规则、公司规章制度以及维特根斯坦著作中数学游戏为例,认为无论是象棋规则、规章制度,还是数字游戏,都可以作为一种行动规则,对人们的行动及其行为起着构成与使动作用。行动者的行动包括反思性监控、理性化认识、动机激发三个方面^[4]。通俗来讲,行动者出于某种动机驱动而展开行动,在行动过程中不断保持对行动的理性化认识以及反思性监控,进而建构起行动的意义,采取相应的策略行动来回应实践活动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与其所处的社会时空及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比如按照某种特定的传统(习惯)进行社会交往与活动开展。

毫无疑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解释行动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创造性活动,以及不同行动者与结构的交互活动所产生的特定结果有很强的解释力。该理论不仅应用于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解释^[5],还可应用于中观的组织行为解释^[6]。有学者直接将其应用到老年组织福利生产和再生产中,认为老年人协会对农村潜在资源整合与乡村规则利用在促进互助养老福利生产的同时,还可以连带塑造新的社会网络结构,促进互助养老福利再生产^[7]。可见,结构化理论有助于系统理解“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和福利价值输出,为我们分析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过程及其结果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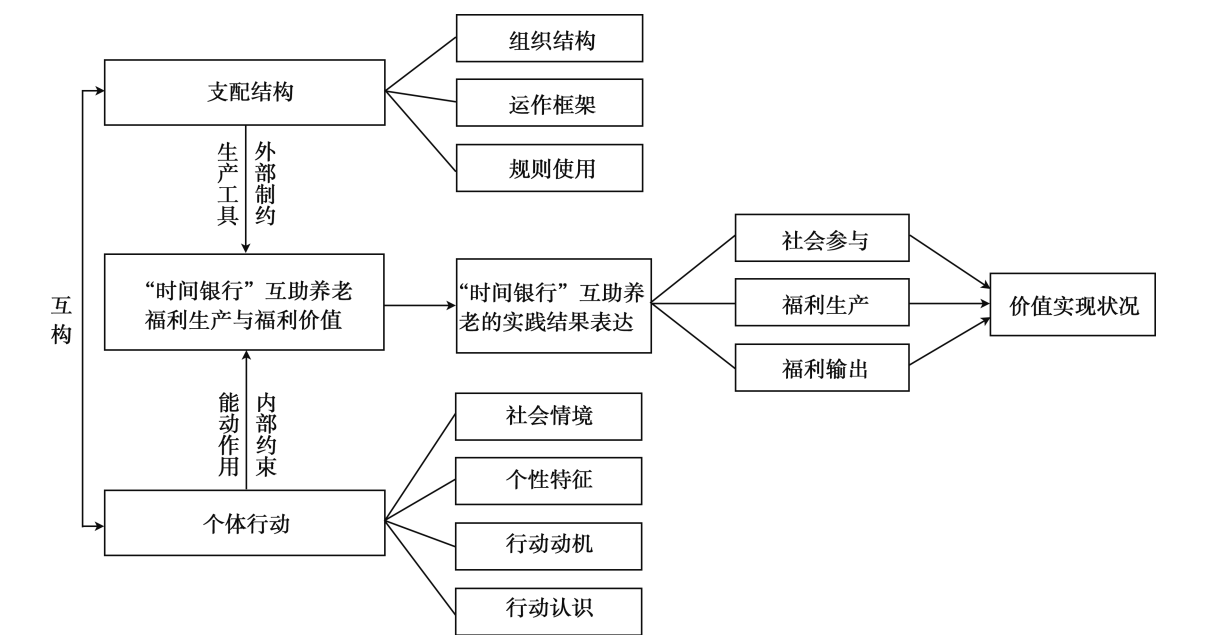


图1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构-行动”分析框架

第一,从结构层面来看,资源与规则构成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结构化条件。与资源的

界定相对应,根据不同资源的支配能力差异,我们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涉及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分别操作化为“运作框架”和“组织结构”。运作框架涉及时间账户、时间存单、存时取时三大要素^[8],它们共同作用将互助资源有效转化为互助养老服务递送,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循环通路。组织结构是指不同层级的行动者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中所形成的结构性安排。通过设置有效的分工协作和共同生产结构体系,有助于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和规避集体行动困境,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良性发展与价值实现。此外,就“规则”而言,不能简单认定成可以张贴或印刷出来的字面条文,也不能单纯从本身内容加以描述或分析,而是结合相关行动或具体情境进行考察。

第二,从行动层面来看,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涉及的行动者包括管理者、组织者、执行者、互助服务提供者、养老服务消费者等多元主体。结构化理论指出,行动者的行动过程既受到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和个性特征影响,也受到自身对行动的意义建构影响,它们共同决定着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进而决定着结构效用的发挥。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行动者会形成策略行动,如老年人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互助养老行动;执行者可以选择消极作为(如选择性执行/形式化执行)或积极作为。正是这些策略行动深刻影响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果表达,尤其是当结构无法有效支配行动者的轨迹与方向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结果就很可能取决于行动者的策略行动。因而,当我们试图勾勒“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行动者的实践逻辑时,既需要关注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和本身的个性特征,也需要深入考察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以及对行动的理性认识与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与行动并非割裂存在,而是互构共生。简单地说,一方面,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结构是行动的结果^{[2]89}。因此,“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实现是“结构-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既需要发挥不同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来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有效运行,也需要投入相应资源与规则来激励、制约行动轨迹与活动开展,避免行动的低效性、随意性,从而提高行动效率与效益。

(二) 研究设计

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剖析“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系统中不同要素的结构化互动状况及其引发的实践结果。具体案例来源于重庆A区^①开展的积分互助养老。“积分互助养老”把服务提供者的“自助-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性互助活动转换成积分,并按照积分来兑换商品,是社区货币性质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2021年4—6月,笔者系统收集重庆A区开展的积分互助养老的制度文本、各种台账记录资料,参与观察7个积分互助养老实施中心的日常生活样态,并围绕积分互助养老的各个环节,对所有涉及的管理者、组织者、执行者、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采取入户调查、座谈的方式与积分互助养老涉及的老年群体进行深度交流与访谈。具体访谈内容以养老服务中心为线索,重点了解中心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上级如何推行积分互助养老、中心积分互助养老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开展、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态度等。在访谈过程中,借鉴社会科学中的过程追踪法,不仅仅满足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更试图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9]。

将重庆A区作为案例来源,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从案例代表性来看,张静^[10]认为,如果通过对案例所出现的关键特征、要素关系或解释原理解构能够启发人们的思考与知识应用,就说明案例及其发现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以A区为案例来源,结合“结构-行动”分析框架,解释为何建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平台却不能产生相应的福利生产与福利价值,在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知识生产的同时,还可将其衍生至其他案例之中,可以揭示出A区案例代表性或价值

① 遵循学术惯例,田野调查涉及的具体名称做了技术化处理,对所有访谈资料也做了匿名化处理。

所在。同时,重庆 A 区积分互助养老在不同乡镇所采取的运行机制具有同质性,其结果也具有同质性,有的乡镇处于“彻底消亡”状态,有的乡镇处于“名义执行”状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心内因其熟悉关系而始终存在着诸多互助实践,如老年人会进行生产性互助、生活性互助(如助浴/助医),部分中心还会开展娱乐活动、丧葬服务、志愿服务、院办经济,这些都没有以“积分”形式来开展。通过选择相同机制的不同乡镇进行横向对比分析,或者说正面案例(中心多元互助实践)、负面案例以及半负面案例的比较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揭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准实验状态”,内在符合因果机制型案例选择方法论要求^[11]。

三、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的形成机理

重庆 A 区地处重庆东北部,下辖 52 个镇乡街道,户籍人口为 173 万人,人口老龄化率 22%,其中 60~69 岁 20.84 万人;70~79 岁 13.56 万人;80~89 岁 4.9 万人;90 岁以上 9000 多人^①。就农村养老资源而言,A 区有 32 家养老服务中心(前身是乡镇敬老院),其中 4 家在建,实际运营的有 28 家。2019 年,A 区通过“公建民营、整体打包”方式将辖区内 28 家养老服务中心以竞争性招商引资方式移交给 Y 企业专业运营,试图利用专业的养老服务技术来提高养老服务资源利用率。并将服务延伸至村级养老互助点以及家庭,以弥补城乡养老服务差距。

Y 企业接手后,为引导中心开展“自助-互助”养老服务,发展院办经济,设计并推行积分互助养老实践。如上所述,积分互助养老是社区货币性质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具体操作办法可以概括为“社会参与、中心组织、公司统筹”,即中心老年人、群众、党员干部等群体是互助服务提供者,他们的服务会被记录并转换成积分,可以用来兑换相应的物品;养老服务中心是一线执行者,他们负责动员社会参与,为每个参与者制定台账,并对照不同积分项目及时记录服务提供者的分数,以及负责相关的积分兑换事宜;公司是规划者、统筹者、监督者,他们制定相关积分互助养老实施办法、人员考核办法,采购积分兑换物品,定期或不定期抽查中心的各种台账,并针对下级中心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与解决。

从中心实践运行结果来看,积分互助养老面临价值实现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是尚未形成有效的社会参与局面。积分互助养老的参与对象主要以中心内居住的老年人为主,中心周围的群众与党员干部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组织与开发;中心内老年人的参与热情、积极性与可持续性不足,很多老年人不参与、形式化参与或工具性参与。二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尚未形成有效的福利生产局面。相关参与主体各自为政、作用分散,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耗费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具体的福利生产环节出现激励性、公平性、及时性等不足问题,不具备有效性。三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被执行者放弃或形式化执行,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福利价值,而且浪费诸多资源投入。为何建构起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平台未能实现相应的福利生产与福利输出?

(一) 结构功能失衡抑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生产

结构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必要条件,对行动者的功能发挥产生使动作用,一旦结构抑制行动者的积极性与功能发挥,那么“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有效执行就会遭到破坏,也就无法保证“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的发挥。

首先,组织结构安排决定着一线执行者的裁量空间以及功能发挥。组织结构规定了不同行动者的权利、责任、义务,可以防范机会主义与促进资源整合和社会资本积累^[12],进而保证“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有效执行。反之,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安排可能使行动者滋生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产生负向影响。其一,上级公司名义上赋予下级中心组织管理权

① 数据来源:区民政局访谈记录,290210524。

利,却没有实质性的权利下放和责任约束,导致上级公司与下级中心之间权责不匹配,拓展了中心管理人员的自主裁量空间和放大层级分割效应。中心负责人X指出:“现在公司化管理,除保证中心的日常生活运行外,更换什么东西、买个什么物品,都需要通过钉钉向公司申请,由公司相关部门来解决与处理。”(20210513)部门经理C指出:“对下面中心的工作人员,公司每个月都会考核他们日常工作以及职业道德,考核分数跟他们绩效工资挂钩,也就是从绩效工资里拿出300元,根据打分情况进行扣除。具体分数是由下面负责人来进行打分的,我们也没有多管。”(20210524)中心负责人L也提出:“我每天基本上做好中心日常工作,做好一些基础台账、食品留样,组织老年人唱歌跳舞、玩游戏、到附近玩耍,根本没有搞积分互助,公司也没有来管我们。”(20210521)其二,事权财权不对称配置,进一步加剧了下级中心的机会主义行为选择倾向。上述中心负责人X的话也可以证明中心的事权财权问题。部门经理C也提出:“下面各个点的积分物品都是由公司进行统一采购的,如果下面的负责人想要更换‘积分’兑换东西,需要跟我们进行报告申请才可以。”(20210524)

其次,“时间银行”运作框架决定着“时间银行”系统的功能结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独特之处在于“时间账户-时间存单-存时取时”运作框架扮演社会交换机制,激发农村社会互助服务行为的频数与频率,进而提高互助养老可持续性和服务规模效应。在重庆A区,时间账户为每一个参与者建立纸质台账;时间存单采取手工作业方式,由中心工作人员对照不同服务项目进行积分记录;存时取时主要由服务提供者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商品,如短袖(20个积分)、拖鞋(15个积分);也有部分服务内容采取经济补偿,比如住院陪护、对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然而,上述运行框架并不足以激活社会交换功能,具体表征为:从交换资源来看,当前的社区货币主要以生活用品为标的物,无法适应并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短期内可能提高老年人参与热情,却不具有长效性、等同性。正如中心负责人Z所言:“积分虽然好,但是积分兑换根本无法积极调动老年人参与其中。”(20210513)从交换过程看,人工记录的方式无法准确及时记录服务提供者信息,无法保障互惠交换的及时性、公平性,还可能引发老年人之间、老年人与中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老年人也提出,“他们也不可能随时看着你”“为什么他的积分比我高”“在兑换东西的时候,还有一些老年人直接开始抢”。(20210513)

最后,为推进积分互助养老,上级公司采取的策略是“权力规训”,具体包括:层级监控,即以“董事会-总经理-业务部门-院点负责人”线性管理来监视内部运行的所有事宜;规范化的裁决,即制定《关于开展积分互助养老的实施办法》《日常管理制度》《人员绩效考核办法》等来进行规范指导与奖惩;检查积分台账、兑换清单、经费使用等^[13]。一线工作人员在组织积分互助养老时,他们主要动用乡土社会的礼俗原则,具体包括:生存伦理,如“你不参加劳动,我就扣你的钱”(20210513);情面原则,如“我都在院里(即中心)工作了十几年,喊他们做什么,他们还是要听话的”(20210507)。然而,一线工作人员实际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公司的雇员内在要求他们服从公司安排和依章办事,作为老年人的代理人内在要求他们从“老年群体本位”出发,为老年群体谋取福利与利益,这预示着权力规训和礼俗原则在各种微观情境中发生冲突,即权力规训和礼俗原则会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规制和关系调节产生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14]。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还面临规则不健全的问题,尤其是上述激励机制、时间银行技术等内容的缺失。可以预见,规则不健全、规则冲突将加大“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难以适应“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稳定发展需要。

(二)个体消极行动抑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生产

个体行动是结构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动力源泉,也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实现的关键。正如马尔利姆·沃特斯所言,“个体不是社会世界的产品甚或摆布的对象,而是创造其周边世界的主体,他们在思考着、感觉着、行动着”^[15]。这意味着如果个体无法建构起积极的行动意义,

这既影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系统,也影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表达。

首先,结构转型引发参与主体间结构性变化及其社区空间变迁,深刻影响着一线行动者的行动与行为。A区中心在公建民营改制前,中心属于政府管理模式,政府授权专人具体负责中心的各项活动,福利生产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物质保障为主。公建民营改制后,中心属于企业管理模式,老年福利空间与营利空间的重叠,中心管理人员及其老年人各种影响中心空间生产与改造行为被限制。对中心管理人员来说,从政府管理到企业管理,自身对中心的空间营造权受到挤压,同时市场化的经营模式以提升效率为目标,从而弱化了公共福利性,这进一步导致他们与老年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用中心负责人Z的话来说,“耗子烤风箱两头受气”。面对这种处境,很多中心管理人员都会选择“消极作为”或“不作为”的行动策略。对老年人来说,公建民营改制后,生活中的例行常规被扰乱,并遭到持续不断的冲击,引发人的焦虑与消极情绪,剥离了与身体控制的安全感和社会生活的某种可预期框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化反应^[16],衍生出系列对抗性行为,集中表现为老年人对公司管理人员和公司行动的抵触与对抗。比如,笔者亲眼目睹老年人将公司员工锁在办公室,并称“积分就是花架子,没有什么作用”。(202100513)可以说,公建民营改制引发的结构性转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权利、社会联系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变迁”^[17],并以其对中心主体间结构性关系和行动者行为影响,弱化了行动者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动力。

其次,行为动机与身份认同决定了行动者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的热情,并在更大范围内影响集体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其一,行为动机激发的是内在需求(如需要)与外部诱因(如经济)相协调的结果^[18],决定着自身行动逻辑以及集体行动结果。从访谈结果来看,组织者并未有推进相关“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内在诉求,如中心负责人L提到:“我们院里(中心)老年人之间本来相处和睦,如果硬要推进积分互助养老,就可能带来老年人之间矛盾,增加我们的工作负担。”(20210521)在外部尽管可以将其纳入日常管理工作范畴考核,但相关绩效考核并未贯彻执行,外在诱因缺失将影响组织者行动动力,“理所当然”实践被组织者们工具化、形式化。其二,身份认同是从“我”到“我们”的再认识,会使个体将群体或组织的观点和目标内化成为自己的观点和目标,有利于增强行为动机与保持集体行动一致性,最终将提高行动绩效^[19]。实践中,不仅管理人员和老年人没有建立起身份认同,而且老年人与组织间也没有建立有效认同关系,“自我本位”必然会影响其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投入度。如中心负责人X就提到:“我每天要负责院内(中心)几十号人的吃喝拉撒睡,还要做各种台账,保证不出什么安全事故,谁有心思来管理这些事情(即积分互助养老)。”(20210522)上述老年人与管理人员/组织者间不良关系也可论证老年人自身及其与组织间身份认同问题。

最后,参与者行动的例行化深刻影响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规模与质量。重庆A区中心的前身是乡镇敬老院,敬老院目前仍居住着因各种特殊原因无法定赡养人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等靠要”“依靠政府”的思维定式与行为习惯,缺乏服务意识与公共性精神,直接制约着老年群体的互助养老服务意愿,尤其是在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时,更加会打消老年群体的互助养老服务意愿。在部分中心内,尽管老年人之间在长期生活中形成了良好的非正式互助传统惯性,以及中心内个别有影响力的老年精英能够组织起较好的互助实践,但因外部制约而无法发挥“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应有价值。

总的来说,通过对不同乡镇互助实践及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比较分析发现,如果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无法从“结构”层面发挥有效福利生产以及权力互动的构成作用,确保“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生产与再生产,也无法从“行动”层面处理好消极行动及内生动力问题,类似“名实分离”“名存实亡”“彻底消亡”的价值实现困境就会持续存在。

四、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实现路径

结合重庆A区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及“结构-行动”理论框架的指引,本文认为,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亟须建构功能协作的治理结构、过程高效的价值生产机制、积极作为的个体行动机制,以保证“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实现。

(一)以矩阵式治理结构增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功能协作

多元主体间权责关系与职能边界清晰合理是推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的前提。其中的根本性问题是解决好纵向制度化的人事/财权关系以及横向分工合作问题。考虑到“时间银行”涉及的“服务递送-时间货币”运行通路,可建立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来增强不同主体、不同层级、不同资源间的功能协作。也就是,在纵向结构设计外,将不同利益相关者联结起来成立横向治理委员会,并共同商议“服务递送”“时间管理”“时间货币”等内容,确定统一的量化标准、操作流程、实施指导方案以及评价监督体系。

第一,从横向分工协作来看,矩阵式组织结构囊括不同层级、不同环节的行动者,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不同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进而提高共同生产绩效。值得注意的是,矩阵式组织结构安排不能等同于“专项治理”项目制形式,而是要打破“线性”和“块块”分割状态,在整合不同条线利益基础上,明确基层组织(如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行政村)元治理地位,确保“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在地化”实现,并按照制度化的工作实施方案开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活动,避免“形式执行”“选择执行”“层级分离”等问题的发生。

第二,从纵向的层级关系来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应将治理中心下移,赋予基层相应的治理权与财权,同时借鉴“整体性治理”“权责清单”“强化问责”的优势,建构起上下互动、有效衔接的权责关系以及问责体系,规范“时间银行”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避免基层组织的寻租行为。着眼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还需要评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行动能力,平衡不同层级间、不同行动者间的价值偏好与行动冲突;考虑“时间银行”经济性、互助服务有效性以及可持续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福利生产效率与效能。

(二)以科学有效的制度化保证“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稳定运转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是一种“期权式”而非“即时式”养老服务供给方式^[20],“延时性”社会交换需要超越信任、道德等私人伦理约束,通过建立健全规则体系来激励与形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福利的有序化、规范化、稳定化的发展。

第一,健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施办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持续发展基础是志愿者积极参与和互助养老服务持续有效供给,这些都取决于服务兑换的科学性与“时间货币”的激励性,因此,需要在具体实施中关注差别性、有偿性、回报性、公平性等原则性问题,具体可以考虑不同养老服务本身的价值性、参与者在不同养老服务中付出的成本及通过服务希望获取的价值来推进“时间银行”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明确“服务时间”与“时间货币”间的转换标准,设置规范化“时间银行”操作流程,建构责任约束与激励制度,以制度优势加速提档治理效能转换。

第二,注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有效执行问题。“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相应的互助养老福利生产来满足老年人的美好晚年生活诉求,如果仅仅将其视作任务或工具来执行,则丧失了养老价值的“时间银行”,就会变成“徒有其表”的服务工具。在具体实践中,应通过一系列助推策略降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交易费用,以激活不同行动者间的合作生产。一方面,需要注重话语表达、绩效考核、互惠激励等机制设计来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执行意愿与力度,并通过基层的有效动员、组织化来推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供给;另一方

面,需要赋予基层弹性操作空间及相应的权利,提高“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三) 设计可持续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工具

“时间银行”作为手段而非目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生产工具将服务递送和“时间货币”的存储、兑换工作勾连起来,最终形成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福利。

第一,探索建立适宜的、可操作的“时间银行”技术系统。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需要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连贯的服务信息的对接、完备的服务记录以及完善的存兑机制。”^[21] 服务对接、服务记录及存兑工作大多以人工记录和纸质资料的“手工作业”方式开展,制约着福利生产效率与效能。因此在“手工作业”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时间银行”覆盖范围及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酌情引进专业化的技术信息服务系统。从志愿者视野来看,如果当期的服务投入无法及时转换成服务记录或者无法得到公平对待,将直接影响民众对“时间银行”平台的信任,这就决定至少需要针对服务记录以及存兑环节建立适宜的技术系统。

第二,建构多样化的“时间货币”兑换办法。互惠交换是“时间货币”兑换的基本原则。在现实中,不同行动者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预期、偏好存在异质性,老年人有的希望从中获取经济补偿,有的希望从中获取服务时间,还有的则希望从中获取物质支持,因此,只有形成多样化的“时间货币”兑换内容,才能刺激与激励行动者的可持续投入行为。在具体的“时间货币”兑换中,需要将服务提供者纳入服务兑换政策制定过程,并根据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反馈建构弹性兑换机制与多维兑换内容,从而避免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

(四) 培育内生动力以提高“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行动绩效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有效运行需要得到组织者与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若要对这两类行动者进行有效动员,需要深入行动者的“内心世界”,审视他们的个性特点、价值主张与利益诉求,采取针对性措施重塑其内生动力,提高“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行动绩效。

第一,以利益和情感来提高行动者的积极性。通常要想保持行动有效性,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利益动员,比如根据需求层次设置激励保障办法,这也是“时间银行”货币属性的体现。此外,情感或缘情策略同样重要。所谓情感策略强调“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共同体成员以及相关组织人员通过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促进正向情感再生构建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协调基层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和过程^[22]。“希望政府跟以前一样,定期过来看望我们”“你们公司的人,没事也下来跟我们还有老年人多交流”等访谈话语,都表明通过情感秩序能够在不同行动者间建构出一套情感认同渠道,由此带动社会参与以及行动者间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生产。

第二,通过“时间银行”再造社区空间。社区空间是集合多元主体的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23],正是社区空间变迁引发A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多元主体的结构关系变化以及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影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实现。笔者认为,在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中,需要通过“时间银行”的服务功能再造社区空间,建构新的符号意义系统,激发行动者的持续性动力。实践中,考虑到个体行动例行化影响,如老年人的“等靠要”特征、长期的思维定式以及对“时间银行”的认知等,“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可能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转变,尤其是给予特殊群体最大限度的包容;积极挖掘农村社会中的精英、能人、积极分子参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宣传、解释以及组织“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同时注意以物质、荣誉、精神等方式肯定他们的工作价值与意义。

第三,以“社区记忆”唤醒农村社会中的“互助”基因。在过去,互助贯穿乡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们不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强加的“单位”,而是在地方历史经验中逐步形成的,以家族纽带、相识和共同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关系^[24]。在长久的社会关系体验中,互助成为镌刻在农民血液中的隐性基因,比如A区养老服务中心内的老年人共同经历过集体劳作和“共做一锅饭”,

有着相同的地方经验与历史经历。组织者可以选择一定策略行动来重建社区记忆,尤其将其置于社区文化建设视野,聚焦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若干操作性活动将镌刻在农民血液里的“守望相助”“互助奉献”等基因激活,并通过新的风俗习惯或社区规约的形式固化下来,进而增强社区社会关联和以此为基础的一致行动能力^[25]。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重庆A区的田野调查和分析发现,即使农村社会存在多元互助实践与基础,建构相应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平台,也不能保证互助养老的服务流程与服务质量,“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仍会面临价值实现困境。究其根源,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安排使得一线执行者获得过度裁量权而选择性地开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活动,而运作框架及其内部规则无法适应社会交换和有效行动构成需要,可能会引发公平性、及时性、长效性、目标冲突等问题,进而抑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过程与福利价值输出。此外,结构转型重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社区空间并引发参与主体间结构关系变化,弱化行动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动力,而身份认同和行为动机的缺失,以及参与者行动的例行化进一步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放大了结构负面效应,使得“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沦为形式化与工具化。可以说,结构功能失衡与个体消极行动共同构成了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的内生机理,而要实现“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需要在结构与行动间寻求平衡,既保证支配结构的功能发挥,也需要个体行动来升华结构化绩效。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重庆A区积分互助养老案例只是农村众多“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中的一种类型,但其出现的困境反映了大多数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是个体在特定时空情境因素影响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以及具体资源与规则的功能性失衡的共同作用结果。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都需要发挥行动者的积极作为,也需要相应的资源与规则支持。本研究所建构的“结构-行动”分析框架可以延伸到其他类型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问题的分析当中。可以说,支配结构的功能发挥、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二者间的有效互动,既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能否发挥应有福利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以及重庆A区对调研的大力支持。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 [1] 刘妮娜.论中国时间银行的特色及发展逻辑[J].城市问题,2020(7):47-55.
- [2]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3]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0.
- [4] 谢立中.主体性、实践意识、结构化: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再审视[J].学海,2019(4):40-48.
- [5] Bryant C G, Jary D. The Contemporary Giddens: Social Theory in a Globalizing Age[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 [6] 钱全.结构化视角下村治场域类型及基层自治分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69-78.
- [7] 王辉.农村老年组织的连带福利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6.
- [8] 李海舰,李文杰,李然.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研究——基于时间银行的拓展路径[J].管理世界,2020,36(3):76-90.
- [9] 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M].汪卫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

- [10]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J].中国社会科学,2018(8):126-142.
- [11] 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0):22-47.
- [12] 毛佩瑾.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及其对政策参与的影响——基于WL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9):204-213.
- [1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兆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14] 郭星华,周延东.规则僭越:转型期的社会失范[J].学习与实践,2013(2):60-64.
- [15]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李康,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7-18.
- [16] 潘泽泉.农民工、身体与社会: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学习与实践,2008(4):140-146.
- [17] 张京祥,胡毅,孙东琪.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14(2):1-6.
- [18] 张爱卿.论人类行为的动机——一种新的动机理论构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14(1):71-80.
- [19] Van Knippenberg D. Work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0, 49(3):357-371.
- [20] 高和荣.互助:时间银行养老的基础与挑战[J].探索与争鸣,2019(8):13-16.
- [21] 陈功.中国特色: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9(8):9-12.
- [22] 潘小娟.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治理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1(6):6-10.
- [23] 叶超,柴彦威,张小林.“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1,31(3):409-413.
- [24]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64-174.
- [25] 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134,207.

(责任编辑:刘浩)

The Dilemma and Valu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Time Bank” Mutual-aid for the Aged: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e-action” Analysis Framework

YANG Kang, SHEN Suyan, LI Fang

Abstract: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time bank” mutual-aid for the aged in A District in Chongq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ucture-action”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dilemma is the result of structural function imbalance and individual negative action. Specificall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perational framework and its rule supply can not play their due function, but breed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nd inhibit social exchange and effective welfare production action of “time bank” mutual assistance pe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community space weaken the production power of the actor’s “time bank” mutual-aid pension value, while the lack of action motivation and identity and the participant’s routine behavior inhibit individual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collective value creation.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time bank” mutual-aid for the aged, it is vital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actors, construct the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design sustainable production tools, and cultivate the endogenous impetus for actors.

Keywords: Aging Population; Time Bank; Rural Mutual-aid for the Aged; “Structure-action” Analysis Framework